



(上接第8版)

守信

蔚字号票号经营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信誉,即票号从来不失信于人。正如蔚丰厚分庄经理李宏龄在其《同舟忠告》一书中提到:“……各字号无论资本多寡,皆足以取信于人。自设立票庄以来,无论官商款项,从未错误。但有外行失信于票号者,从无票庄失信于外行者。咸丰年间发逆之乱,地丁银饷皆由票庄汇兑,从无错误,有案可查。即近年庚子之变,无论京外各庄,从无一款失信,此尤中国商民所共见闻。”

蔚字号票号久著信誉,在当时,来自社会各界的赞颂声几乎是随处可见。1898年9月14日,《中外日报》在《票号禀请立案》一文中这样称赞蔚字号等几家山西票号:“规例之整肃严密,交易之公平信义,商旅无不称便”;1906年5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山西冀宁道丁宝铨《劝办银行函》文章,文中提到:“晋省汇号之信义,其见于各行省已数十年”;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山西票号业尤其赏识。191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称赞山西票号“信用一层,尤其显著”,还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外国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有,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夸于世人之前!”

蔚字号票号的信义既表现在诸多方面,也表现到诸多层次。

一是急公好义。前文已提到侯东家众兄弟及分庄经理们遇到国家急饷、各省遇

介休侯家:

巨富化作过眼烟云

灾,踊跃慷慨捐款,博得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为善必昌等嘉奖的许多事例。蔚字号东家及大小经理们的信义气质还表现在与官吏的结交和对贫寒亲友的接济上。据李宏龄撰《同舟忠告》等文记载,像户部尚书赵尔巽,甘布护督毛庆蕃这一类官员,在蔚字号票庄内支用几千两银子,一般是“待其有钱,自行归还”等办法。再如,李宏龄进票号做事,起先是由同乡曹惠林保荐的。曹惠林家境贫寒,李宏

龄平日里时常给予接济,尤其在曹惠林病故后,李宏龄更主动负责赡养其一家,直到其子女长大能够自立。

二是顾全整体利益,不搞损人利己之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曾出现讹言,一些人见风是雨,纷纷到炉房(冶炼银铺)提兑现银。各票号皆有银存放在炉房,有的票号担心炉房受此风波而倒闭,也纷纷要求提现。在危急关头,京师蔚丰厚票号出面,联络同业,陈述利害,并拿出巨款接济炉房,不仅避免了一损全损,而且稳定了京师的银市,工商界莫不称颂。

三是别人可以失信自己,但自己不能失信别人。蔚泰厚经理毛鸿翔,靠侯东家给的双份人力股分利。积得20多万两银子后,开始醉心于发展自己的天地。他先后在安泽县和府城镇等地购置土地500多项,在中条山购买山林六七处,每年仅地租收入4000余担粮食。他还特地在泽城开设了“义泰昌粮店”,向佃户放高利贷。此外,他还在平遥开设了晋泰昌布庄及日升烟店,在晋南曲沃开办了日升烟厂。毛鸿翔对此还不满足,花费大批银两,为全家五世男女捐买官职,男的捐“将军”“大夫”,女的买“夫人”“恭人”,可谓全家大小,无一不是官员。毛鸿翔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侯东家却对此不仅不过问,有时反而为其添股加资,成全了其做平遥县第一流的财东梦。

蔚字号票号经营90多

年,时值国内战乱不止。每次战乱的发生,票号几乎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无论损失多少,票号总是剜肉补欠,先还清欠别人的款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蔚盛长驻京的伙友们慌乱中卷走账本和银两逃出北京,然而在赶回山西的途中遭遇土匪,账本和银两全部被抢。幸好,蔚盛长的司账人雷士炜凭借记忆,将账目重新修集。

蔚字号六票号实行同东联考制度,各号之间又实行分支连保制。大家平时注重积蓄“预防之款”,遇有不测时用以补亏还欠,或是“一地受损,别处接济”。这既避免了全军覆没,又培养出一支团结整肃的经商队伍。

光绪二十六年,虽说是蔚字号一些商号损失惨重的一次,但由于东家能拿出预防之款,这次受到损失的无论是京津、上海,还是汉口、山西的商庄,蔚字号对所欠持券者全部及时兑现,此举反而使得票号赢得了声誉。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这次事件记述到:“幸赖各埠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一书中还提到:“独我号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付。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下转第10版)